

# 译者声音与译本形变

## ——《死水微澜》2014 年英译本研究<sup>\*</sup>

张 婕

(南京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66)

**摘要:**李劫人历史小说《死水微澜》2014 年英译本长期以来遭到国内外译学界忽视,而该译本因译者强势显声呈现出别样面貌,这在中国现代小说英译史上并不多见。本研究以译者声音理论为指导,以 2014 年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文本内和副文本两个层面入手,考察译者的强势显声及其造成的译本形变。研究发现:在文本内层面,译者通过对小说叙事结构的改写和译文语言的视觉化与异质化强势显声,使得译本偏离了原文的叙事及语言风格;在副文本层面,译者通过对译本进行去虚构化和历史文化赋值强势显声,从而将小说打造为时代预言和成都历史文化读本。译者强势显声的表层动因在于译者的“另类”忠实观,深层动因在于“契约邀约机制”在翻译文学中的普遍运作。

**关键词:**《死水微澜》;李劫人;英译;译者声音

## Translators' Voice and the Deform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ishui Weilan* (2014)

ZHANG B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66, China)

**Abstrac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 Jieren's historical novel *Sishui Weilan* published in 2014 is largely ignored by scholar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However, due to the forceful presence of the translators' voice, the translation takes on characteristics not commonly seen in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odern Chinese stories. The present research,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translator's voice, traces the translators' forceful audible presence in this translation on both textual and paratextual level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on the textual level, the translators' voice manifests itself via the rewriting of the novel's narrative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visualiz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of the target text, thus deviating from the narrative and linguistic styles of the source text, and that on the paratextual level, the translators make their voice audible via defictionalization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assignment, thus recasting the novel as a prophecy of the time and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ader of Chengdu. The translators' forceful audible presence is ostensibly dictated by the translators' "unorthodox" view of faithfulness, but fundamentally by "the pact - inviting mechanism" prevalent in translated literature.

**Key words:** *Sishui Weilan*; Li Jieren; English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voice

\* 译者胡志挥先生、斯巴林先生耐心解答研究过程中的疑问,外审专家及华中师范大学魏家海教授、安徽科技学院王文强博士对本文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 1. 引言

李劫人(1891–1962)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师”(李欧梵 2011)、新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祖师”,著有小说《同情》《天魔舞》《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其中,后三部长篇历史小说构成“大河三部曲”,“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上)。李劫人的小说代表作《死水微澜》于1936年首次出版,为“五四后最早出现的新长篇历史小说”(杨继兴 1989:1)。小说以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1894年–1901年)这一段历史为时代背景,以四川成都郊外的天回镇为故事场景,以女主人公的身份嬗变为情节中心,描绘出安定得如死水般的古城在时代风潮下激起的历史微澜。《死水微澜》现有两个英文全译本。第一个全译本为199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熊猫丛书系列之 *Ripples Across Stagnant Water*,无译者署名,经笔者考证,译者实为喻璠琴<sup>①</sup>与胡志挥。该译本于2015年由外文出版社再版。第二个全译本为莫文·亚细亚(Merwin Asia)公司于2014年出版的 *Ripple on Stagnant Water: A Novel of Sichuan in the Age of Treaty Ports*,译者为布莱特·斯巴林(Bret Sparling)与殷驰(Yin Chi)夫妇。

这部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刘再复 1999:19),目前并未引起国内外译界学者的充分关注。据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只有5篇论文和1本专著专题研究或部分涉及《死水微澜》的英译。这些论著除 Jing Chen (2019) 与陈婧(2018)兼论两个全译本外,其余均以1990年英译本为研究对象;研究话题涉及叙述视角的转换(钟璇 2021)、人名与称谓翻译(张丹 2020)、文学方言翻译(Chen 2019;陈婧 2018)以及小说的译介与传播(蒋林欣 2019;蒋林欣、张叹凤 2013)。通过比对细读《死水微澜》及两部英文全译本,笔者发现2014年英译本存在译者强势显声和译本形变现象,而目前以该译本为考察对象的英译研究对此未有涉及。鉴于此,笔者拟以译者声音理论为指导,以《死水微澜》2014年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以1990年英译本为参照,对2014年英译本中译者的强势显声及其造成的译本形变进行系统考察,进而揭示造成译者强势显声的内在动因。

## 2. 译者声音

“译者声音”概念由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于1996年正式提出。Hermans (1996:27)认为,译文叙事话语中除存在原文叙事者的声音之外,还存在第二种声音,即译者声音,译者声音是译者话语存在的索引。他指出,译者声音在不同译文中隐现程度不同,或完全隐藏于叙事者声音背后,在译文中无法察觉,除非将译文与原文进行对比;或冲破文本,以其自身名义发声,如在译者注中使用第一人称以彰显其发声主体身份;或介于二者之间。Hermans(同上:28)总结了译者显声的三种情形:1)译文向隐含读者靠拢,发挥其交际媒介功能。由于原文蕴含历史文化信息,译者常常需要直接、公然入侵译文话语,提供必要信息,以确保译文读者理解(Munday 2008:15)。2)涉及交际媒介自身的自我指涉。当原文中出现由于语言这一交际媒介自身特点所导致的一词多义、文

<sup>①</sup>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1990年和2015年版《死水微澜》英译本 *Ripples Across Stagnant Water* 均出自胡志挥一人之手(蒋林欣 2019:110–111;蒋林欣、张叹凤 2013:121;张丹 2020:427;陈婧 2018:102; Chen,2019:708),然而从胡志挥先生发送给笔者的电子邮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来看,两版译本前四章译者实为喻璠琴,只有最后两章译文出自胡志挥之手。喻璠琴参译1990/2015年版《死水微澜》英译本这一事实在《中国翻译词典》对于译者喻璠琴的简介中得到了印证:“定稿的小说有:《茅盾小说选》,李劫人的《死水微澜》、《丁玲作品选》、《吴祖缃小说选》、《陆文夫小说选》等。”(林煌天 1997:886)2014年英译本主译为 Sparling,殷驰负责译稿的审读与修订,以及与主译就小说中的方言、文化词、史实、语义以及翻译的准确度等问题进行探讨(2021年12月18日电子邮件)。此外,Sparling还是“译者序”与“附录2”的实际作者。基于此,有理由认为译本中译者声音主体主要为 Sparling。

字游戏等不可译现象时,译文可能会召唤译者声音以使用括号或注释的形式公开介入(同上:15)。3)情境多元决定。原文中出现的特定情境和语言形式导致不可译(同上)。“以上三种情形中译者的显声度取决于其采用的翻译策略以及策略的运用是否前后一致”(Hermans 1996:28)。杰里米·芒迪(Jeremy Munday)对译者显声情形进行了补充。Munday(2008:15)指出,即便不进行原文与译文的对比,仅通过副文本信息如评论性序言、评价性脚注、图书封面等,也能明显感知译者声音。若将原文与译文对比,在译文删减、改写或概括之处也可发现译者声音。此外,语言风格转变也是译者声音的表现形式。卡门·米连-薇尔拉(Carmen Millán-Varela)(2004:42-47)则将译者声音分为三种类型:译者的可见显身(visible presence),包括译文脚注、开首页信息如译者署名等;译者的声音显身(audible presence),这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译文读者通过译文语码中“噪音”(即语法错误和伪译入语形式或曰杂语)的存在所能发现的译者显身形式;译者的非可见显身(invisible presence),主要表现为译文的异国情调和异质性。塞西莉亚·阿尔夫斯塔德(Cecilia Alvstad)与亚莉珊德拉·阿西丝·罗莎(Alexandra Assis Rosa)(2015:3-4)更是对翻译中存在的声音进行了全面梳理,将其归纳为文本声音(textual voice)与语境声音(contextual voice)。前者产生于译文内部,是译文的组成部分,包括叙事者声音、人物角色声音以及译者通过译文文本所呈现的声音。后者与翻译过程的社会学特征有关,与参与译文生产、宣传和评论的多方产生关联,常出现于诸如译者前言、译评、脚注、作者、译者及出版商之间的通信、访谈等一切围绕译文而产生的文本之中(Alvstad et al. 2017:3, 5; Alvstad 2013:208)。译者声音是文本声音和语境声音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研究主要以上述学者总结的译者声音显声情形为理论依据,探寻2014年英译本中译者的强势显声痕迹。经分析,笔者发现该译本在文本内和副文本两个层面均存在译者强势显声现象,文本内层面主要表现为小说叙事结构的改写以及译文语言的视觉化与异质化,副文本层面主要表现为对译文的去虚构化和历史文化赋值。两个层面的译者显声共同导致译本发生形变。

### 3. 文本内层面的译者显声<sup>②</sup>与译本形变

在文本内层面,译者主要通过小说叙事结构的改写以及译文语言的视觉化与异质化强势显声,从而导致译本发生形变。

#### 3.1 小说叙事结构的改写与叙事风格偏离

2014年英译本删除了小说第一部分“序幕”,将其安置到附录1中,这是对小说叙事结构的显著改写,也是译者强势显声的重要表征。Munday(2008:15)就曾指出,在译文删减、改写之处均可发现译者声音。译者Sparling(2014:xvi)为论证其改写行为的合理性,在“译者序”中对删除“序幕”的原因进行了解释:首先,“序幕”描述了叙事者童年时期在家族墓园遇见故事女主人公蔡大嫂及其子金娃子的情景,并预示二人日后将成为其姻亲。然而,此人物关系预言最终未能在后文及三部曲姊妹篇中兑现。其次,“序幕”篇幅较长,作者用大量笔墨进行风景描写,还设计了几个与故事主线毫无关联的人物。尽管“序幕”讲述的故事本身颇为有趣,却延缓了小说的叙事进程。再者,“序幕”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而后文及姊妹篇中均未延续该视角,小说叙事视角未能统一。

译者在“序幕”删除过程中扮演着英语文学系统内部专业人士的角色。Sparling为英国文学专业出身(Sparling & Yin 2014:318),师从普利策奖获奖作家安妮·狄勒德(Annie Dillard)学习写作,

<sup>②</sup> 2014年英译本主译为Sparling,殷驰负责译稿的审读与修订,以及与主译就小说中的方言、文化词、史实、语义以及翻译的准确度等问题进行探讨(2021年12月18日电子邮件)。此外,Sparling还是“译者序”与“附录2”的实际作者。基于此,有理由认为译本中译者声音主体主要为Sparling。

创作过三部小说(2021年12月27日电子邮件),谙熟英语文学诗学规范。他以批评者的眼光敏锐地察觉出小说中不符合译入语主流诗学规范的部分,并进行改写,以便让小说译文为英语世界读者接受(Lefevere 2010:14)。此外,作为李劫人的崇拜者(2021年12月18日电子邮件),译者还自觉肩负起提升作为英语文学的译文的质量与维护作家形象的重任。从译者删除“序幕”的原因来看,译者实际上将“序幕”视为小说叙事结构的“瑕疵”,并把自己摆在了完善者的位置,试图通过删除“序幕”实现小说叙事人称的统一,加快叙事进程,去除多余人物,让小说以更“合理”,甚至更“好”的面貌呈现给英语世界读者。

然而,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这一改写行为终究导致了对原文叙事风格的偏离。首先,《死水微澜》采用连环式叙事结构展开事件,“人物跌相出现,层层相因,环环紧扣。由人物而引出事件,由事件而交待人物”(阿明 1989:101)。小说“由序幕中的祭祖扫墓而引出邓么姐,由邓么姐而展开兴顺号,由此引出罗歪嘴烫顾天成的‘毛子’——激起两种势力的相激荡。”(同上:101 – 102)删除“序幕”,不仅改写了主人公邓么姐(即邓幺姑,后来的蔡大嫂)的出场方式,还削弱了小说连环式叙事特征。其次,作者在“序幕”中不惜用大量笔墨描写邓幺姑的出众容貌,为后文情节的展开做好充分铺垫。删除“序幕”,后文中邓幺姑的进城梦以及袍哥和粮户顾天成为其争风吃醋的情节都势必失去必要前提。再者,“序幕”采用悬念叙事手法,以预告方式留下系列谜团。“序幕”中,众人皆对蔡大嫂颇有好感,唯独父亲评价蔡大嫂“品行太差”,却并未解释原因为何,随后以一句“一直到后来若干年,集合各方传闻,才恍然爹爹批评的那句话,乃是有这么一段平庸而极其普遍的故事”(李劫人 2011:12)吊足读者胃口。继而又“剧透”多年后与蔡大嫂结成姻亲,而父亲竟对其“备极恭敬”(同上),前后态度的巨大反差似又暗示背后的故事极不寻常。删除“序幕”,悬念叙事手法无从体现,系列谜团也随之遗失在翻译中,少了对后续情节跌宕起伏特征的暗示,译文读者阅读体验的丰富性势必遭到削弱。

译者删除“序幕”,改写小说叙事结构,不仅偏离了原文叙事风格,还强势干预了译入语读者对小说的解读方式,缩小了小说的可阐释空间。所幸的是,“序幕”只是从“台前”进入“幕后”,并没有彻底消失,感兴趣的译文读者依然可以按照原文叙事顺序阅读小说,亦可按照译者指定的“路线”踏上阅读之旅,甚至双管齐下,对比两种阅读体验之间的差异。

### 3.2 译文语言的视觉化、异质化与语言风格偏离

2014年英译本与原文以及1990年英译本相比,存在语言视觉化与异质化的明显倾向,这是对原文语言风格一定程度的偏离,也是译者显声的表现形式(Munday 2008:15; Millán-Varela 2004:44)。“语言视觉化”是一种语言视觉修辞行为,是修辞者“以语言文字符号为传播媒介,以取得最佳视觉效果为目的的修辞行为”(陈汝东 2005:48)。笔者现摘取2014年英译本中语言视觉化的典型译例进行分析,为凸显该译本的译者显声度,笔者将1990年英译本作为参照一并列出。

(1) 田里的青蛙到处在喧闹……(李劫人 2011:27)

译文1:...frogs broadcast concentric rings across the surface of the paddies...(Sparling & Yin 2014:21)

译文2:...frogs croaked in the deserted fields...(喻璠琴 1990:60)

本例原文读起来视觉化效果不甚明显,却因“青蛙”“到处”“喧闹”三词组合,容易激起强烈的听觉感受。译文2用croak(呱呱地叫)较为准确地再现了“喧闹”一词的语境语义,而译文1却对原文进行了视觉化处理。首先,用frogs与broadcast两词传递出“蛙声喧哗”之义,又通过concentric rings(一圈又一圈同心圆)这一意象的增补,使得译文不仅再现了原文蛙声喧哗之听觉体验,还增加了声波引起水波扩散这一别具动感的唯美视觉体验,使得译文生动性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原文。经与Sparling先生沟通,笔者得知:译者摒弃了与原文语义的严格对应,看似不忠,实则选择忠

实于其阅读原文后所产生的主观感受。对于英语母语人士而言,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在阅读体验上存在很大差异。在译者看来,“田”是“里”的上半部分,“田”“里”二字组合,字形仿佛从右向左扩散;“喧”的“口”字旁,看起来就像青蛙鸣叫时口角边鼓起的泡泡。读完整个句子,译者产生的直观感受是句子呈现出一种同心序列(*concentric series*),恰似青蛙鸣叫产生的声波在稻田水面扩展开来的画面(2021年12月27日电子邮件)。译者从原文汉字字形出发,结合语境,在其心中构建起了话语的视觉形象,进而把这一心理形象,转换成语言文字符号,诉诸译文读者,通过心理还原为读者心理上的视觉形象(陈汝东2005:48),是典型的语言视觉修辞行为。

(2) 在灰黑瓦屋丛中,也像大海里涛峰似的,高高突出几处雄壮的建筑物……(李勤人2011:14)

译文1: And amid the dark tiles, like waves catching sun over an inky sea, there rear up several higher structures that you can readily identify:…(Sparling & Yin 2014:4)

译文2: …Above them, like waves in the sea, towered several imposing buildings…(喻璠琴1990:43)

本例原文将灰黑瓦屋丛中突出的几处建筑物比作大海里的涛峰,以新奇的比喻描绘出建筑物的高耸以及建筑物之间高度的参差不齐,也凸显了瓦屋丛与建筑物在外观上的巨大反差。译文1将喻体“涛峰”改写为 waves catching sun(逐日的波涛),增补了 catching sun 这一逐日意象,从而将原文中用涛峰摹写的建筑物高耸的静态画面改写为海浪逐日这一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动态画面。虽然原文划线处同样运用了视觉化语言,译文1却大大增强了原文的视觉化效果。此外,译者还将“大海”译为 an inky sea,通过增补 inky 一词,不仅强化了“灰黑瓦屋丛”与“大海”在色彩方面的相似点,还增强了修辞的视觉化效果,正如陈汝东(2005:48)所说,“颜色词语本身就具有引发视觉形象的功能”。译文1与原文划线处虽然未能做到语义严格对应,却再现了比喻这一修辞手法,通过喻体再造,强化了整个比喻句的视觉效果,是不可多得的佳译。译文2则忠实再现了原文划线处的语义、修辞手法和视觉化效果,译者声音几乎完全隐藏于译文叙事者声音之后,视觉化效果也远弱于译文1。

(3) 有点冷风,不算很大,万没有将这黯淡的云幕略为揭开的力量。(李勤人2011:194)

译文1: …, a light wind blows, strong enough to penetrate the clothes, but far too weak to lift any hem of the dismal gray. (Sparling & Yin 2014:229 )

译文2: There's a cold wind, not too strong, certainly not enough to dispel this gloomy canopy. (胡志挥1990:309)

如果说例(2)译文1不过是强化了原已视觉化的语言的视觉化效果,本例译文1则将非视觉化表达予以视觉化。“云幕”是指由云层堆积形成的帷幕,将“云”这种虚无缥缈的物质喻指为可触可感的实物“幕”,从而使得“云”具备了被“揭开”的可能。译者将原文中体现云幕揭开幅度的抽象程度副词“略为”译为具象实词 hem(衣物的下摆、卷边),不仅赋予了颜色词 dismal gray 以如同衣物般的物化特征,还巧妙再现了原文中程度副词“略为”的含义。译文2仅靠 dispel(驱散)一词无法传递出“揭开”的幅度“略为”的含义,也无视觉化效果可言。

2014年英译本除具有语言视觉化特征之外,还存在大量异质化表达:

(4) 门前人(李勤人2011:77)	doorman (脚注: literally, the man in front of the door: husband) (Sparling & Yin 2014:81)
(5) 通皮(同上:86)	tōngpí—adepts of the underworld(同上:97)
(6) 老子(同上:116)	your liege(同上:132)

(7) 老婆(同上:19)	old lady(同上:11)
(8) 洋教(同上:34)	maritime religion(同上:29)
(9) 至今你恐怕还在鼓里呢? (同上:177)	Even now I bet you're in the drum on this. (同上:209)
(10) 蠢东西(同上:125)	You spring-grub clod(同上:144)
(11) 你问也不问人家一句(同上:120)	...you don't even ask a body what it was(同上:138)
(12) 呜呜呜(同上:133)	wooo-ooo-ooo(同上:152)

在方言土语(例(4)(5))、詈言俗语(例(9)(10))、谦词(例(11))、称谓语(例(6))、拟声词(例(12))甚至普通用词(例(7)(8))中,有许多词在译入语中都存在对等表达,然而译者却舍弃显而易见的选择,转而采用直译、直译加注、音译、音译加注等方法,力求再现原文的语言表达形式,凸显译文语言的异质性。以“蠢东西”为例,译者舍弃诸如 *you fool* 之类的归化式译法,而是用 *clod* (笨蛋)再现这一詈骂性称谓的核心语义和詈骂功能。为凸显詈骂方式和称谓的异域特色,再现“蠢”字字形给译者带来的视觉感受,同时实现与原文音节数的对等(2022年3月15日电子邮件),译者还补充了前置修饰语 *spring-grub*,以 *spring* 译“春”,以 *grub* 译“虫”,分别传递出“蠢”字各组成部分的语义。不可否认的是,原文中的地方性表达对于非川籍中国读者而言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异质性,然而,译者却大大增强了译文语言的异质性。笔者曾向 Sparling 先生咨询译文中大量使用异质性表达的用意。他(2021年12月18日电子邮件)指出,如果他认为原文读者能够从作者的措辞中感受到匠心独运,他就会着力再现该措辞的表达形式,若译为寡淡无味的用词,是不准确的。对于方言土语,还会努力为译文读者再造原文给非川籍中国读者带来的阅读体验。正如许钧(2021:91)教授所说:一名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应该努力识别并“保留原作在词语、句式、叙事等多层面的异质性,担负起传达差异、开拓语言空间、再现原作文学性、丰富文化的使命”。

#### 4. 副文本层面的译者显声与译本形变

“副文本”(paratext)概念由法国叙事学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指存在于正文本周边,用于协调正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的辅助性文本要素,包括封面、标题、前言、后记、插图、附录、书评、访谈等(Genette 1997:xviii, 1, 5)。据第二章所述,Hermans、Munday、Millán-Varela、Alvstad 与 Rosa 这五位学者均将译文的副文本视为译者显声的重要场域。本研究主要关注2014年英译本中三种形式的副文本——译者序、脚注和附录。通过比对细读该译本与小说原文,笔者发现译者在副文本层面的显声主要表现为“去虚构化”和“历史文化赋值”,两种形式的显声导致译文化身为时代预言与成都历史文化读本。

##### 4.1 去虚构化与时代预言

以第一人称发声的译者序是译本中译者显声度最高的场域之一。2014年英译本有逾四页篇幅的“译者序”,分为五个部分,其中“关于小说”部分篇幅长达两页,内容包括翻译缘起、李劫人的旅法经历、旅法期间侨民文学的兴盛、旅法经历对李劫人文学创作的影响、李劫人与屠格涅夫在旅法经历和创作思想方面的相似性,以及小说的当下指涉,只字未提小说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却用了近一半篇幅两次将小说描写的社会现实与译者当时所处的成都平原的社会现实挂钩,强调二者之间的高度相似性。如“译者序”第二段,译者以第一人称强势发声:

《死水微澜》描写的完全是我所生活的小镇。这部小说成书于1935年,故事发生的时间还要往前推35年左右,却与2007年的成都平原遥相呼应。风景有所变化,但变化不大;李劫人描写的

社会结构如今依然分化；城乡居民仍然相互鄙薄；农村姑娘依然怀揣着进城梦；瞄准他们的人贩子仍未绝迹；本土迷信依然受到外来传教士信仰的冲击；黄、赌、毒卷土重来，仿佛未曾消失过；黑社会依然遵循着忠义之规，其兄弟会遍布全国，成为拥有与政府类似组织结构的地下组织；农民依然感觉与成都隔绝，成都依然与北京隔绝，北京也依然与世界中心隔绝。（Sparling 2014:ix – x）

随后，在“关于小说”部分结尾处，译者又用大段文字从小说情节中挖掘出更多社会现象，逐一与当下现实进行类比：小说里的八抬大轿被福特福睿斯小轿车取代；两人抬轿子被桑坦纳出租车取代；哥老会化身为活跃在各个领域的地方犯罪团伙；鸦片馆被 KTV 或遍地开花的网吧所取代，40 岁以下的年轻人成天把大把光阴虚度于此；各派基督教信仰依然代表着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传教士遍布中国大地，原来虔诚、仁爱、不善交际的基督教徒化身为外国非政府组织或和平队志愿者，常常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小说中的重大事件——打教堂正好与近年来因几起国际事件（如 2008 年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1999 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而引发的对外国公司和驻外使团的袭击遥相呼应（Sparling 2014:xii）。

通过将小说中的社会现象与一百多年以后四川的当下现实——对号入座，译者将虚构与现实等同起来，从而赋予了小说以时代预言品质，却忽略了即便是历史小说也终究摆脱不了其虚构本质。笔者曾向译者求证是否有意引导译文读者结合当下中国社会现实对小说进行解读，译者坦承这一意图，并指出：读《死水微澜》很容易发现小说人物是原型人物，故事情节也如寓言一般，简单朴实又具有永恒魅力。李劫人揭示了一些基本社会结构模式，即便经历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也依然得以延续（2021 年 12 月 18 日电子邮件）。即便在“未来，当我（指译者，笔者注）曾经待过的竹林被连根拔起，家庭农场被合并为工厂化农场，这些现象和人物看起来不再具有如此强烈的当下感，也无法继续保持其永恒魅力，我依然希望将其记录下来，以见证它们曾经延续过，至少，延续到了 2007 年”（2022 年 3 月 5 日电子邮件）。然而，译者对于小说的当下阐释，又一次操纵了译文读者对作品的解读方向，进一步缩小了小说的可阐释空间。

除译者序外，译者还通过另一显声场域——脚注对小说中的地名、事件和机构名称进行了去虚构化处理。如作者在小说中解释了故事发生的中心地“天回镇”名字的由来：安禄山之乱导致唐玄宗逃离长安，逃往成都，刚到此地不久又因叛乱平息转而回銮，即所谓“天旋地转回龙驭”。译者在脚注中增补了唐玄宗出逃和回銮的年份，还提供了其在成都建立朝廷，并让位于其子唐肃宗等史料信息，并指出李劫人对于天回镇名字由来的解释，至今依然为天回镇居民所熟知，并在当地继续流传（Sparling & Yin 2014:6）。译者声音以脚注形式侵入译文文本，通过以上信息的增补，势必强化“天回镇”的非虚构印象。又如“上头奉了一道皇太后的电谕”（李劫人 2011:166）一句，译者在脚注中通过补充慈禧太后发布谕旨的具体日期“1900 年 6 月 21 日”及谕旨内容“对外国势力宣战”（Sparling & Yin 2014:195）强调事件的真实性。再如“等老葛来，看他在南院上听的消息如何”（李劫人 2011: 169）一句中看似普通的机构名称“南院”，译者也不厌其烦地在脚注中通过指明其当下地理位置强调其存在真实可考：“南院指总督衙门，与当今省政府同位于督院街，地处政府街正南边，即以前县衙门的所在地”（Sparling & Yin 2014:199）。

此外，Sparling 还在附录中多次明确提出探寻小说与现实天回镇之间关联的愿望。如“2008 年，我第一次怀揣着走进小说，找到小说中描写过的人物和建筑踪迹的愿望来到天回镇”（Sparling & Yin 2014:265），“找到了一家我自认为是罗歪嘴和蔡大嫂吃过饭的餐馆”（同上:265），后来证实该餐馆曾是关帝庙，袍哥常来此供奉关羽，也找到了天回镇最初的轴心，还找到了小说译文第二部分第一节提到的一品店（同上:266）。即便后来译者“寻觅与小说关联的努力大多无果而终”（同上），他依然不愿接受这一现实，借其信息提供者之口暗示小说与现实成都平原的关联：“我的信息

提供者称,这并非意味着这些建筑和人物(指罗歪嘴、蔡傻子、兴顺号、云集栈、火神庙,笔者注)都是李劫人创造的,它们肯定在成都平原以外的某个地方真实存在过,而且很可能连名字都一样。作者只是把它们搬到了天回镇而已。”(同上)

附录中,译者对天回镇四位居民的访谈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证实”小说所写人、事真实性的作用。其中一位受访者曾像罗歪嘴一样当过袍哥,他的讲述涉及其所亲历的小说故事元素,包括天回镇码头的真实存在、码头的等级制度、记忆中的鸦片馆等。译者还向其咨询罗歪嘴在码头上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袍哥的命运,袍哥对于关羽的敬奉是否属实,小说对于家禽、粮食集市均设在关帝庙的说法是否属实,袍哥与犯罪团伙的区别等,无一不将虚构指向现实。另有一位受访者与罗歪嘴一样有走江湖的经历,他对此段经历的分享,证实了走江湖确有其事,走过江湖的人确有其人,罗歪嘴这一人物确实存在现实生活原型。一位女受访者以其亲身经历证实了小说中邓幺姑怀揣的进城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四川农村普遍存在,城乡隔阂依旧,蔡傻子与邓幺姑的包办婚姻依然盛行,基层官员依然欺压老百姓,甚至连蔡傻子也在该受访者丈夫身上找到了原型。此外,二人还谈及一品店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命运,小说中提及的川陕公路的扩建等。访谈内容不断在小说与受访者自身,虚构与现实,历史与当下之间来回穿梭,为小说的历史写实性、社会指涉真理性以及人物设置真实性提供了佐证,同时也强化了小说的时代预言品质。

#### 4.2 历史文化赋值与成都历史文化读本

所谓“历史文化赋值”,是指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发掘原文中的历史文化资源,并赋之以更大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以彰显或提高译文的历史文化含量。2014年英译本译者主要在脚注和译者序中对译文进行历史文化赋值,这一赋值行为属于Hermans(1996:28)归纳的译者显声的第一种情形,即由于原文蕴含历史文化信息,译者常常需要直接、公然入侵译文话语,提供必要信息,确保译文读者理解,只不过译者的赋值目的已经远远超出了便于读者理解这一最基本目标。

小说译文共计146条脚注,涉及人名、地名、称谓、官职、度量衡、历史事件与人物、节日、民俗、计时纪年法、文化专属词、情节勘误、底本差异、古籍名作、黑话野话、俚言俗语、戏剧名称、白头帖子语言特色分析等,其中涉及历史文化信息的脚注比例高达92%,而原文注释为32处,主要为方言俗语释义。可见,译文的历史文化赋值现象十分明显。以小说次要人物妓女“刘三金”名字的英译为例:该名字看起来普通无奇,加之安置于次要人物,即便是普通中国读者,恐怕也不易关注其内涵,而译者在脚注中将“三金”直译为“Liu Three-Gold”之余,还对作者命名的用意进行了文化解读:“三金”让人联想起对朋友女儿的尊称“千金”,而“三金”只有其价值的千分之三,由此可知刘三金是一个贬了值、掉了价的女人(Sparling & Yin 2014:39)。此时,译者角色已经不限于语言转换者,他还以作品文化内涵的阐释者和导读者的身份显声。

除脚注之外,译者还在译者序中进行历史文化赋值。如译者序“关于翻译”部分,译者以约80%的篇幅对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三个文化专属词“袍哥”“江湖”“摆龙门阵”的出处及正确译法进行了考辨。以“袍哥”的英译为例,译者首先指出现有通行译法的不当之处:将该词翻译为“gowned brother”仿佛表明袍哥最突出的特征在于着装方式,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袍哥的着装与众不同,“袍”字虽然与服装有关,但放在该词中,重点不在于对袍哥服装进行命名,而在于强调袍子是将袍哥兄弟凝聚在一起的物件。随后,译者通过考证该词的两种起源,论证了其译文的合理性:首先将该词追溯到《诗经》诗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指出同袍兄弟最初指的是兵营里的战友(Sparling 2014:xiii);其次将该词追溯到三国时期关羽对于其结拜兄弟刘备的忠诚,指出这种忠诚与袍哥对于关羽的敬奉是一脉相承的。

笔者曾就译文中大量存在历史文化赋值现象的原因与译者进行过探讨,译者解释:原因之一在于

他为寻求相关问题的答案做了大量研究,希望借译文将研究成果与读者分享,之二在于希望一定程度上再现作者的作注风格(2021年12月18日、2022年3月5日电子邮件)。诚然,在该译本的主要底本1936年中华书局初版《死水微澜》中(Sparling 2014:xv),作者注释多达32处,主要涉及方言俗语,此外还有少量黑话。有学者在考察“大河三部曲”后断言:“对方言作诠释,是李劫人的一个特出贡献。李劫人充分注意到方言的地域性和局限性,花大功夫为一些颇具特色的字、词作注、作诠。追本溯源,深入、拓宽到音韵学、文字学、语言学以至训诂学等文化领域。”(张玉林 1989:108)译者不仅延续了作者勤于诠释、精于考证的风格,而且将其发挥到极致。笔者认为,历史文化赋值行为还与译者对于目标读者的定位有关。译者虽然将目标读者定位为所有爱好英语文学的读者,却聚焦于侨居成都的英语人士和历史爱好者。前者通过翻译阅读中国作家作品,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听说过李劫人;后者喜欢读脚注,不惜大费周章去寻找像云集栈这样的历史古迹(2021年12月18日电子邮件)。可以说,译者的历史文化赋值行为强化了小说作为成都历史文化读本的特质。

## 5. 结语

《死水微澜》2014年英译本译者强势显声,在文本内层面改写小说叙事结构,对译文语言进行视觉化、异质化,使得译文偏离了原文的叙事与语言风格,在副文本层面对译文进行去虚构化和历史文化赋值,从而将小说打造为时代预言与成都历史文化读本。最终,译者呈现于英语世界的是第一部打上了鲜明译者个人烙印的《死水微澜》。

从表面上看,译者强势显声的幕后推手是译者的“另类”忠实观:改写小说叙事结构,是译者忠于其作为英语文学内部专业人士的审美趣味的结果;对译文语言进行视觉化与异质化,是译者忠于其作为译入语读者在面对迥异的语言文字系统时产生的审美感受的结果;对译文进行去虚构化处理,是译者忠于其作为四川长年侨居者对成都题材小说的代入式阅读体验的结果;对译文进行历史文化赋值,是译者忠于其作为成都历史文化考辨者的研究式阅读体验的结果。然而,无论译者是直接声称还是间接表露忠实,在 Alvstad(2014:275)看来,无非意在让译文读者确信,“其干预并未显著改变原文故事或话语”,译文只是对原文这一异域文本的真实记述,从而达到取信于译文读者的目的(同上),并继而促使其将译文视为原文进行阅读。这就是“翻译契约”(translation pact)的运作机制。Alvstad(同上:270)认为,翻译文学中存在一种契约邀约机制(pact-inviting mechanism):出版商和译者合力创建一种翻译契约,邀请译文读者将译文视为原作阅读。即便译者在译文中显声,不仅不一定打破契约,反而会促使译文读者信赖译者,从而起到强化翻译契约的作用。《死水微澜》2014年英译本译者虽然强势显声,却依然无时无刻或直接或间接地标榜忠实,不自觉地参与到翻译契约的构建与维护中。

《死水微澜》2014年英译本是中国现代小说英译史上难得一见的“另类”存在,值得学界继续关注。

## 参考文献:

- [1] Alvstad, C. The translation pact[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14, 23(3): 270 – 284.
- [2] Alvstad, C. Voices in translation[C]// Gambier, Y. & L. Doorslaer.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Volume 4).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 [3] Alvstad, C. & A. A. Rosa. Voice in retranslation[J]. *Target*, 2015, 27(1): 3 – 24.
- [4] Alvstad, C. , Greenall, A. K. , Jansen, H. & K. Taivalkoski-Shilov. Introduction[C]// Alvstad, C. , Greenall, A. K. , Jansen, H. & K. Taivalkoski-Shilov. *Textual and Contextual Voices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 [5] Chen, J. On re-instantiation of literary dialects: A systemic functional approach [J].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2019, 9(6): 706 – 711.
- [6] Genette, G.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M]. Trans. J. E. Le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7] Hermans, T. The translator's voice in translated narrative [J]. *Target*, 1996, 8(1): 23 – 48.
- [8]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0.
- [9] Li, J. *Ripple on Stagnant Water: A Novel of Sichuan in the Age of Treaty Ports* [M]. Trans. Bret, S. & Chi Yin. Portland: Merwin Asia, 2014.
- [10] Millán-Varela, C. Hearing voices: James Joyce, narrative voice and minority translation [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04, 13(1): 37 – 54.
- [11] Munday, J. *Style and Ideology in Translation: Latin American Writing in English* [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8.
- [12] Sparling, B.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C]// Li, J. *Ripple on Stagnant Water: A Novel of Sichuan in the Age of Treaty Ports*. Portland: Merwin Asia, 2014.
- [13] 阿明. 李劫人历史小说结构谈 [C]// 成都市文联编研室. 李劫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9.
- [14] 陈婧. 从《死水微澜》译本看文学方言的翻译 [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0(6): 100 – 106.
- [15] 陈汝东. 论视觉修辞研究 [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1): 47 – 53.
- [16] 蒋林欣. 李劫人的现代转型与海外传播研究 [M].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9.
- [17] 蒋林欣, 张叹凤. “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英语世界的李劫人研究成果与现象 [J].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13, 24(3): 120 – 139.
- [18] 李劫人. 李劫人全集(第一卷)·死水微澜 [Z].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
- [19] 李欧梵. 招传统文化之精魂, 需创造性和想象 [N]. 成都日报, 2011 – 10 – 10.
- [20] 林煌天. 中国翻译词典 [Z].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21] 刘再复. 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 [J]. 北京文学, 1999, (8): 6 – 28.
- [22] 许钧. 关于文学翻译的语言问题 [J]. 外国语, 2021, 44(1): 91 – 98.
- [23] 杨继兴. 长篇历史小说传统形式的突破——论李劫人历史小说的独创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C]// 成都市文联编研室. 李劫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9.
- [24] 张丹. 《死水微澜》英译本人名、称谓翻译分析——以胡志挥译本为例 [C] // 孙丁. 外语教育与翻译发展创新研究(第九卷).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 2020.
- [25] 张玉林. 语言的瑰丽宝库民俗的百科全书——李劫人长篇历史小说独特风格探微 [C]// 成都市文联编研室. 李劫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9.
- [26] 钟璇. 《死水微澜》1990 年英译本中叙述视角的传译 [J]. 作家天地, 2021, 563(5): 138 – 140.

**基金项目:** 南京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十四五”规划课题“中国现代小说英译中的民俗文化价值建构——以《死水微澜》英译本为例”(22NYWY07)

**收稿日期:** 2022-04-23

**作者简介:** 张 蓓(1986- ),女,湖北荆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